

中亚学刊

ZHONGYA XUEKAN



2

中華書局

中亚学刊

第 二 辑

中 国 中 亚 文 化 研 究 协 会 编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主 编：马 雍

本期编辑：王 诤 宋 岷 宋晓梅 余太山
吴 焯 吴玉贵 康右铭 谢 方
谢孝苹

中 亚 学 刊

第 二 辑

中 国 中 亚 文 化 研 究 协 会 编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16·16印张·302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1,700册

统一书号：11018·1428 定价：2.70元

ISBN 7—101—00196—3/K·87

中 亚 学 刊

第 二 辑

目 录

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	吴初骧 (1)
贵霜帝国的年代体系	黄 靖 (16)
《太伯里史》所载唃哒史料笺证	宋 颀译 余太山笺证 (51)
米国钵息德城考	马小鹤 (65)
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	吴玉贵 (76)
吐蕃饮馔与服饰	王 尧 (136)
论海亚姆四行诗	王家瑛 (146)
沙皇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	康右铭 (188)
沙俄侵略中亚的要塞线	吴筑星 (210)
编后记	(249)

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VOLUME II CONTENT

The Yu-men-guan (Jade Gate) in Han Dynasty and the Ways to Western Regions	Wu Reng-xiang (1)
On the Chronologies of the Kushan Empire	Huang Jing (16)
Notes on the Tabari's Annals Concerning Ephthalites	Song Xian Yu Tai-shan (51)
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ity Bo-xi-de in the State of Mi	Ma Xiao-he (65)
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Anxi Du-hu-fu in Tang Dynasty	Wu Yu-gui (76)
Tibetan Diet and Dress	Wang Yao (136)
On the Khayyam's Quatrain	Wang Jia-Ying (146)
The Russian Aggression Against Tannu Urianghai	Kang You-ming (188)
The Fortification Line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into Central Asia	Wu Zhu-xing (210)

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

吴 初 骧

关于汉代玉门关址问题,数十年来不少学者作过考证,其中向达、夏鼐先生曾进行过实地考察,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分析。近来,马雍同志在《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》一文中(见《中国史研究》1981年第1期),又作了重要补充。现就近年来亲身参加汉代长城调查与考古发掘的收获,对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的变迁,试作某些新的探索。

(一)

自清末以来,史学界多以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为汉代玉门关址。这种意见的主要依据有两条,一为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(A. Stein)在小方盘城北侧台地边采获之“玉门都尉”等简;一为《汉书·地理志》敦煌郡条,有“龙勒,有阳关、玉门关,皆都尉治”的记载。不难理解,小方盘城既出“玉门都尉”简,当为玉门都尉府,而“关都尉”治所应在关城,故玉门关口也应小方盘城。唯陈梦家先生认为,“武帝置于敦煌西北的是‘玉门都尉’而非关都尉”,故“玉门关口只能在T14古城(按即小方盘城——引者)之西或西北,即T11—12之间或T13—14a之间”(1)。

关于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址问题,我在《玉门关与玉门关候》一文中(见《文物》1981年第10期),根据1979年新获之敦煌马圈湾(D21)汉简资料,已作了一些推测,认为在小方盘城以西11.5公里的羊圈湾,即东经 $93^{\circ}44'$ 、北纬 $40^{\circ}41'$ 处,亦即斯坦因编号T11与T12a之间(按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号为D20与D22之间。T为斯坦因编号的缩写,D为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号的缩写。下同。由于D21为斯坦因所遗漏,故原无编号)。这里不再赘述。

当前,与西汉玉门关问题有联系的,尚有两个问题,有待这里进一步澄清。

其一,玉门都尉是否为“关都尉”。

如前所述,史学界不少同志持玉门都尉为“关都尉”的意见。但据敦煌汉代长城的实地考察资料和历次出土的汉简资料分析,陈梦家先生玉门都尉为部都尉的意见更为可信。根

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,西汉时期,敦煌郡有玉门、阳关、中部、宜禾等四个都尉,其中宜禾、中部两部都尉无疑为部都尉。阳关都尉,以都尉置于“阳关”而得名。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,当为部都尉(关于这个问题将另作探讨)。玉门都尉,虽下辖“玉门关”,但根据多方面的资料分析,亦应为部都尉。

为了说明这个问题,拟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。

1、就建制与吏卒人数看。据居延、敦煌汉简,西汉边郡所置之部都尉,均上属郡太守,下辖候望、仓廩、邮驿等职能系统。重要的部都尉,名衔前加“将屯”、“将兵护屯田”、“将军”等称谓,兼理屯兵、屯田事。候望系统有候、部候、燧等三级,分置候、候长、燧长等长吏和丞、塞尉、候史、士吏等属吏。屯兵、屯田、仓廩、邮驿等系统,与候望系统之三级相应,亦各设千人、司马、农令、亭长、啬夫及丞、令史、佐等职务。

今据敦煌历次出土汉简,玉门都尉之全称,或为“酒泉玉门都尉”,或为“敦煌玉门都尉”(2)。故玉门都尉在敦煌建郡之前,当属酒泉郡太守统率;敦煌建郡后,改属敦煌郡太守管辖。玉门都尉之下属,据王国维考证,有玉门候与大煎都候等两候官(3),候官下各置若干部候和亭燧。玉门关直属玉门候管辖,故玉门候又称玉门关候。关置啬夫与佐治理(4)。又据马圈湾新获汉简,玉门候所属有“仓亭燧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百五十三,沙州“西北至河仓烽二百四十二里”,此“河仓烽”当指汉代之“仓亭燧”。燧旁之大方盘城,旧称“河仓城”,西距小方盘城约7.5公里。据此城的建筑形制与布局,为仓储所在当无疑问(5)。而此城位于玉门都尉辖区之东界(6),应属玉门都尉管辖。

玉门都尉辖区,锁控西域门户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,故常驻屯兵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酒泉郡玉门县条,师古注:“阹駟云,汉罢玉门关屯,徙其人于此。”又,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,顺帝阳嘉四年,“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,及玉门关候、伊吾司马”,救车师后部。东汉废部都尉,留障塞尉(7),玉门关候所领之屯兵,西汉时当属玉门都尉统辖。

玉门都尉尚领有屯田。据马圈湾新获汉简:

入郡仓,居摄三年四月癸卯,转一两。居摄三年三月戊辰,大煎都士吏牛党、候史尹钦,受

麦小石卅七石五斗。就人效谷益寿里邓尊。(79.D.M.T5:250)

玉门关外有大量粮食运入关内之郡仓,非有大面积屯田,是难以做到的。

玉门都尉的属吏人数,虽无直接资料,但部都尉当有之官属称谓,在历次出土之敦煌汉简中,均已多次出现。以下引马圈湾新获汉简为例:

玉门部士吏五人,候长七人,候史八人,燧长廿九人,候令史三人。(79.D.M.T9:38)

此简所载为玉门候的直属吏员,尚不包括候官掾属和玉门关以及邮驿的吏士,但仅此人数已达五十二人。如以此数推测大煎都候的吏属人数,加上屯兵、屯田、仓廩等系统的吏

属人数,和各系统所率之戍卒,玉门都尉所领之吏卒,其规模当比敦煌郡的其它三部都尉为大。

2、就管辖范围看。玉门都尉,如前所述,下属玉门候与大煎都候等两候官。玉门候的管辖范围,据实地调查,东自大方盘城(T18, D32),西至显明燧(T8, D16),全长直线距离34公里,现存烽燧遗址十七座⁽⁸⁾。大煎都候,经实地考察,其管辖范围东自T7(D15),西南至T6d(D1),全长直线距离45公里,现存烽燧遗址十一座。又,疏勒河以北,尚有烽燧遗址四座,由T1(D9)至D6,直线距离15公里,亦属大煎都候管辖。故大煎都候的实际管辖范围达60公里。

将上述两候官管辖范围相加,可知玉门都尉的实际管辖范围,按直线距离计算,全长达94公里,现存烽燧遗址三十五座。较之敦煌郡的阳关、中部两部都尉,管辖范围稍大,而比宜禾都尉略小。

3、就建筑形制与布局看。西汉边塞防御设施分城、障、坞等三级,由部都尉、候官、燧长分别驻守。今据实测,小方盘城为一夯土版筑方城,南北长24.40米,东西宽23.60米,墙厚4米,现存高度10.05米(北墙),早期开北门,晚期以土壅封闭,开西门。在敦煌西北现存之城障遗址中,以此城为最大。结合T14(D25)出土之“玉门都尉”简分析,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治所是无疑的。但该城与1973年在甘肃金塔县发掘之肩水金关遗址,形制绝然不同,不应为关门遗址⁽⁹⁾。据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西北的考古发掘资料,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之马圈湾遗址,为玉门候官治所。马圈湾遗址西南0.6公里之羊圈湾,为西汉玉门关址⁽¹⁰⁾。这种布局,与张掖肩水都尉、肩水候官和金关的布局基本相同。据甘肃省文物队调查,肩水都尉治所位于毛城〔按贝格曼(F. Bergman)称大湾城,但据调查,黑河对岸之夯土版筑城始称大湾城〕,北距肩水候官治所(地湾城)约9公里,金关南距肩水候官治所约0.6公里。此种格局大约是西汉边塞制度所规定。

4、就辖境与郡县区划的关系看。玉门都尉辖境,东临中部都尉,西与居卢訾仓相接。其东界位于大方盘城⁽¹¹⁾,西界止于大煎都候所属之广昌燧(T6d, D1)。广昌燧的方位在东经93°09′、北纬40°08′。居卢訾仓的位置,据黄文弼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引陈宗器《罗布荒原》称:“由玉门关西九十里至榆树泉,疑即都护井也。由此西北行五十四里,入绵延三十里之迈赛群(无数奇怪小岛之谓)。出迈赛群五里有沙丘,即魏略中所述之三陇沙,沙堆狭长,向西北伸展三里。出沙不远,有废墟垣址可辨,即居卢仓遗迹也。十五里为五棵树。”按“五棵树”即今毗牙井(贝什托格拉克)。据此方位,居卢訾仓的位置大约在东经92°52′、北纬40°30′。

汉龙勒县的辖境,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百五十三,沙州西北于河仓烽“与废寿昌县分界”。按唐寿昌县本汉龙勒县⁽¹²⁾,故汉龙勒县东界应在大方盘城。又,居卢訾仓,据黄文弼

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和敦煌马圈湾新获汉简,应属西域都护领护。故龙勒县西境应在居卢营仓以东,亦即库木塔格沙漠东缘之哈拉齐附近。据此,则西域都护辖境的东界与敦煌郡龙勒县辖境的西界,是以三陇沙为线划分的。

由此可知,玉门都尉的管辖范围与龙勒县的北境是一致的。而这种情况与中部都尉担负敦煌县北境之防务,是完全相同的。中部都尉辖区,东起扬威燧(T26、D69)、西迄朱爵燧(T19、D33)。扬威燧东距宜禾都尉临介燧3公里,距今敦煌县界1.5公里,如按两燧之间取其中,中部都尉东境与今敦煌县东界一致。朱爵燧西与大方盘城相接,即汉敦煌县与龙勒县分界处。故中部都尉辖境与汉敦煌县北境是完全一致的。

综上所述,玉门都尉在规模、布局和辖区等方面,均与部都尉的制度相符,故应为部都尉的建制,而非“关都尉”;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治所,而不是玉门关址。

其二,武帝太初二年以前,玉门关是否在敦煌以东。

对此,向达、夏鼐先生已作过周详的论述。近年,马雍同志又作了进一步探讨。正如马雍同志指出的,沙畹(E. Chavannes)、王国维根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提出玉门关西迁的问题,向达先生认为武帝派使节所遮之玉门,为玉门县非玉门关的意见,都是一种误解,即认为玉门关为敦煌郡西界。

如前所述,玉门都尉非“关都尉”。事实上,玉门关也不是玉门都尉辖区西界。据实地调查资料,玉门关位于玉门候官辖区的中段偏西,关外属玉门候官管辖的烽燧现尚存四座。在玉门候官辖区以西,有大煎都候官辖区。故玉门关外,属玉门都尉管辖的区域,大致估算约有2000平方公里。

大煎都候官辖区,经调查,似包括今榆树泉盆地。盆地的东部,由于洪水的不断侵蚀,戈壁边缘被切割成马迷兔、吐火洛、天桥、湾窑等四个小盆地。盆地内,地势平坦,水源充裕,生长着茂密的芦苇(*Phragmites communis*);红柳(*Tamarix ramosissima* Ldb.)和稀疏的胡杨(别名胡桐, *Populus euphratica* Oliv.)等植物,是戈壁、沙漠、沼泽地区,较为理想的垦区。据上引马圈湾79、D.M.T5:250号汉简记载,大煎都候官有大量粮食经由玉门关转输入郡仓。由此可知,西汉时期,玉门都尉统率之屯田吏卒,是驻于玉门关外之大煎都候官辖区的。故李广利所率之数千残兵,暂驻于关外之玉门都尉屯田区,是毫无困难的。如前所述,玉门都尉辖区与敦煌郡龙勒县北境一致,玉门都尉屯田区位于敦煌郡境内,故李广利虽被阻于玉门关外,但仍可称为“留敦煌”。细读《汉书·李广利传》可知,李广利初伐大宛失利后,原拟罢兵返内郡,但行抵大煎都候官后,由于汉法森严,未敢擅入玉门关,故报请朝廷允准。武帝“使使遮玉门”后,被迫留屯于此,并在此补充兵员、粮秣。太初三年二次伐大宛时,即由此地出征。故“发天下七科适,及戍补给贰师,转车人徒相连属”所至之地点为“敦煌”。李广利

出兵远征之地点称“敦煌西”。因此，认为玉门关曾经西迁的根据难以成立。在整个西汉时期，玉门关从未迁移，应是确凿无疑的。

(二)

东汉时期的情况有所变化。据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：“建武六年，省诸郡都尉，并职太守，无都试之役。省关都尉，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。”又，“边县有障塞尉”。故东汉时，敦煌郡已无都尉建制，玉门都尉被裁撤，但设有玉门关候（见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。

据《流沙坠简》簿书类第四十三简：

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，玉门障尉成告：候长晏到任。

陈梦家先生认为，“玉门障尉可能是候官（即玉门候官）在东汉之称，亦即是障塞尉”^{〔13〕}。此意见是确当的。

关于东汉玉门障尉治所，陈梦家先生推测在小方盘城。当是。我在《玉门关与玉门关候》一文中已经指出，马圈湾遗址在王莽末期已被废弃，与此同时，玉门关已关闭，长城烽燧也多半废弃。东汉时，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，始终未恢复至西汉的规模。

根据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调查，小方盘城以北的西汉塞墙，其走向自大方盘城往西后，在T15(D28)处折向西南，止于贼娃子泉边，然后自贼娃子泉西岸开始，向西偏南延伸，至马迷兔，在T4a(D11)处折向南，止于一风蚀台地边。

东汉时期，马圈湾烽燧遗址以东的塞墙，似乎经过重修，部分地段，高度至今保在三米以上。但临要燧(T11、D20)以西的塞墙、烽燧，则全部废弃，塞墙建筑现今仅剩残迹。尤其是临要燧(T11、D20)西北的八堆积薪，七堆均在塞墙遗迹之外，一堆正置于塞墙遗迹之上，证明此塞墙废弃的时间更早。与此同时，原置于塞墙之内的烽燧，由于塞墙被废弃而失去屏障，故以烽燧为中心，于四周另筑坞墙。此种形制，正是塞外烽燧的格局。

临要燧(T11、D20)以西的塞墙西汉后被废弃，还可从斯坦因采获之汉简中得到印证。据劳干《敦煌汉简校文》（《居延汉简考释》附录，台北，1960年版），小方盘城(T14、D25)以西所出的纪年简，仅临要燧(T11、D20)有东汉桓帝永兴元年（公元153年）的历谱，而临要燧(T11、D20)以西各烽燧，有西汉宣帝元康三年（前63年）至王莽居摄三年（公元8年）各时期简，而不见东汉纪年简。由此可知，东汉时期，临要燧(T11、D20)以西已无戍卒驻守候望，其原因可能与玉门关入西域路线的改道有关。

与废弃临要燧(T11、D20)以西障塞同时，东汉时期，自小方盘城至阳关遗址，新筑一道南北走向的塞。据调查，这道塞，北起小方盘城以北之贼娃子泉南岸，南至南湖墩墩山，全长

50公里,现存烽燧三座。在这道塞的北段,以小方盘城为圆心,向西呈一弧线,筑成塞墙。塞墙北起贼娃子泉南岸,南止于城南3公里。塞的南段仅筑成壕沟。非常明显,北段塞墙专为拱卫小方盘城而筑(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,在斯坦因的调查报告,认为小方盘城北之跌水泉为疏勒河。现经查实,跌水泉西北有洋水海子,往北有贼娃子泉,再往北出塞墙,经一片戈壁后始为疏勒河,南距小方盘城7.2公里)。

综上所述,东汉时期,由于入西域路线的变更,临要燧(T11、D20)以西障塞烽燧的废弃,在裁撤玉门都尉之后,将玉门候官治所由马圈湾遗址(D21)东迁至原都尉治所——小方盘城(T14、D25),并在小方盘城西侧新筑南北向塞墙,以加强防卫。根据各种迹象分析,此时,玉门关口亦东迁至小方盘城西侧之塞墙上。但目前尚无更多的材料可资说明,有待于将来小方盘城及其西侧遗址的发掘来证实。

(三)

西汉通西域的道路,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:“自玉门、阳关出西域有两道。从鄯善傍南山北,波河西行至莎车,为南道;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、安息。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、波河西行至疏勒,为北道;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。”但这段记载,对于玉门关至莎车或疏勒的路线,记述过于简略。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,还应参考《魏略》的记述。《三国志·东夷乌丸鲜卑传》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云:“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,前有二道,今有三道。从玉门关西出,经婼羌转西,越葱岭,经县度,入大月氏,为南道。从玉门关西出,发都护井,回三陇沙北头,经居卢仓,从沙西井转西北,过龙堆,到故楼兰,转西诣龟兹,至葱岭,为中道。从玉门关西北出,经横坑,避三陇沙及龙堆,出五船北,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,转西与中道合龟兹,为新道。”其中关于中道与新道的记载较为翔实,为我们探讨汉代的具体路线,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关于西汉北道,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,当自车师前王庭始。但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云:“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,当道小国恐,各坚城守,不肯给食。”又,“宛国饶汉物,相与谋曰:‘汉去我远,而盐水中数败,出其北有胡寇,出其南乏水草。’”又,“初,贰师起敦煌西,以为人多,道上国不能食,乃分为数军,从南、北道。”又,“于是贰师后复行,兵多,而所至小国莫不迎,出食给军。至仑头,仑头不下,攻数日,屠之。自此而西,平行至宛城,汉兵到者三万人。”据此,李广利初次伐大宛,由玉门关西出,经盐水至大宛;二次伐大宛,分军两路,一路由北道,经盐水、仑头西行至太宛,一路由南道至大宛。按,盐水即盐泽;仑头即轮台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云:“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,……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,往往起亭,而轮台、渠犂皆有田卒数百

人,置使者校尉领护,以给使外国者。”又云:“鄯善国,本名楼兰,……楼兰国最在东垂,近汉,当白龙堆,乏水草,常主发导,负水儋粮,送迎汉使。”又云:“初,武帝感张骞之言,甘心欲通大宛诸国,使者相望于道,一岁中多至十余辈。楼兰、姑师当道,苦之。”由此可知,西汉北道当自楼兰始,由楼兰经渠犂、乌垒、轮台而至龟兹。其走向当如《魏略》所言之中道。故武帝征和四年(前89年),遣重合侯马通“击匈奴,道过车师北,复遣开陵侯将楼兰、尉犂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”之时,宣帝地节二年(前68年),遣郑吉、司马熹“将免刑罪人田渠犂,积谷”,“至秋收谷”,“击车师,攻交河城”时,其行军路线,均由渠犂经尉犂、焉耆、危须,而至车师,而车师王逃往乌孙后,“乌孙留不遣,遣使上书,愿留车师王,备国有急,可从西道以击匈奴”。所谓“西道”,即由渠犂,越焉耆盆地,而达于车师的道路^{〔14〕}。

但是,自敦煌以西至楼兰一线,自然条件极为困难,尤以三陇沙、白龙堆一带,环境险恶,素为旅行者视为畏途。西汉采此路线,当为地理环境和当时政治形势所迫。

以地理环境而言,塔里木盆地为天山、喀喇昆仑山、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所环绕,仅东部有宽约70公里之缺口与河西走廊相连。但此缺口为我国极端干旱区之一,其自然景观之显著特点为,剥蚀残丘低山、戈壁、风蚀地、沙丘、盐土平原穿插交错。缺口南端为库木塔格沙漠,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,全为流沙,主要分布于沟间梁状山坡,其山前地带之沙垄,因受东北风影响,多作东北至西南向依山坡延伸,故历史上称之为“三陇沙”。但在沙漠东缘,南北向沟谷的源头,有泉水出露,水分植被条件较好,为沙山中不可多得的绿洲,如多坝沟、崔木土沟等,为长途跋涉沙海者提供了休憩露宿地。库木塔格沙漠之北,为疏勒河下游和罗布淖尔。疏勒河下游,由于库木塔格沙漠北部东北向突出部的阻挡,向南流入榆树泉盆地,旧称低石湖。盆地内,遍布沼泽、湖泊,沼泽周围等地下水浅处,多为光裸之结壳盐土和盘结盐土,起伏难行;但东部和南部边缘处,有泉水出露,可供通行。罗布淖尔为塔里木盆地最低处,海拔仅780米,被库木塔格沙漠北部突出部与榆树泉盆地分隔。在罗布淖尔东北,库木塔格沙漠与克孜勒塔格山之间,有一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断层带,内有毗牙井(贝什托格拉克)、库木库都克等多处泉水出露,差可行人。由于疏勒河下游、罗布淖尔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下游地区的河、湖相沉积层,不断受风力之侵蚀,在此间形成风蚀台地和风蚀凹地相间之“雅丹”地貌,致使地面支离破碎、坎坷不平。在罗布淖尔碱地北端东、西侧,以粘土组成之风蚀台地,顶面多有盐壳层,故历史上称之为“白龙堆”。由于风蚀地貌的发育,加之起伏的盐壳层(一般起伏在1米左右,最大可达3—5米),使这一带的交通条件极为艰辛。但此地以北为库鲁克塔格山脉所阻,以南为阿尔金山脉分隔,由中原入西域,以经由此地的路径最为直捷。故西汉使西域者,虽历尽风险,仍采此线进入塔里木盆地。

西汉采此线的另一重要原因,乃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。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、《汉书·西

域传》等有关史籍记载,武帝元封三年(前108年)前,西域为匈奴所控制。蒲类海以东为匈奴日逐王领地,日逐王不仅占据吐鲁番—哈密盆地,并置僮仆都尉,“常居焉耆、危须、尉犁间”,控制塔里木盆地出入口,以掠取西域各国之人力、财物,支持匈奴与汉王朝的斗争。武帝即位后,为“断匈奴右臂”,控制塔里木盆地入口,于元封三年遣从票侯赵破奴俘楼兰王,破车师,“因暴兵威以动乌孙、大宛之属”。未久,又于太初元年至四年(前104—前101年),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伐大宛,“贰师将军之东,诸所过小国闻宛破,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,见天子,因为质焉”。随后,于北道置渠犂屯田,“置使者校尉领护,以给使外国者”。昭帝时,再置轮台屯田。但直至宣帝,汉才遣卫司马郑吉“使护鄯善以西数国”。此时,汉虽完全控制南道,然而“未能尽并北道也”。汉王朝未能“尽并”北道的原因,在于对车师的争夺。车师,位于天山南北之通道口,为匈奴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主要交通枢纽,匈奴控制车师,不时袭扰北道,给汉使进入西域构成严重威胁。故对车师的争夺,成为汉与匈奴在西域斗争的焦点。匈奴“单于、大臣皆曰:‘车师地肥美,近匈奴,使汉得之,多田积谷,必害人国,不可不争也。’”自武帝天汉二年(前99年)后,汉与匈奴在车师多次易手,直至宣帝元康四年(前62年)后,汉才暂时控制了车师,“置戊己校尉屯田,居车师故地”。宣帝神爵三年(前59年),匈奴“日逐王畔单于,将众来降,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。……乃因使吉并护北道,故号曰都护。都护之起,自吉置矣。僮仆都尉由此罢,匈奴益弱,不得近西域”。至此,汉王朝始完全控制北道,于北道中心、近渠犂屯田区之乌垒城,置都护府,以屯田校尉属都护。元帝时,复置戊己校尉,屯田车师前王庭^[15]。宣、元时期,汉对西域之经营达到鼎盛。故西汉北道,亦以此时最为畅通。

至于玉门关至楼兰段的走向,据近年实地调查与新获马圈湾汉简资料,自玉门关西出后,当沿长城内侧西行。如前所述,西汉塞墙止于榆树泉盆地东侧之马迷兔。由小方盘城向西至塞墙终点,沿线除被沼泽、湖滩切断外,未见有设置关口之遗迹。塞墙终点的南北两侧,属大煎都侯管辖之烽燧,呈扇形分布于榆树泉盆地东侧。其中位于马迷兔西南之烽燧,均筑于盆地边缘之砂梁或风蚀台地上,面向盆地,有的烽燧并于盆地与烽燧间设置“天田”。故西汉入西域的路线,应沿塞墙内侧向西偏南,至马迷兔附近折向西南,沿烽燧内侧之砂梁间,经吐火洛、天桥墩泉至湾窑。今马圈湾新获汉简中,如:

□□吏士妻子□□,乌孙归义侯霍清子□,到大煎都候障。(79.D.M.T5, 51)

皇帝陛下,始建国天凤三年十二月壬戌,达敦德玉门千秋燧。(79.D.M.T5, 140)

皇帝陛下,始建国天凤四年正月甲戌,达敦德大煎都候障。(79.D.M.T5, 141)

“敦德”即敦煌,为王莽所改名。玉门千秋燧的位置,尚不可考。但据马圈湾新获简:

元康元年七月壬寅朔甲辰,关啬夫广德、佐熹,敢言之,敦煌寿陵里赵负,趣自言,夫祈为千秋燧长,往遣衣用。以令出关。敢言之。(79.D.M.T9, 27)

据此,千秋燧应位于玉门关外,属玉门候官管辖的四烽燧之一。大煎都候,据王国维考证,治凌胡燧,即T6(D3)⁽¹⁶⁾。该燧位于湾窑北偏西之砂梁上。证明西汉与西域之交通,确经塞墙内侧往西至湾窑。

湾窑以西的路线,据灰胡燧((T6c、D2)、广昌燧((T6d、D1)分布之方位,应沿烽燧南侧,即库木塔格沙漠北缘与榆树泉盆地结合部之泉水带西行,至哈拉齐。今有逶迤曲折之古道可证。再由哈拉齐向北,沿榆树泉盆地西侧,亦即库木塔格沙漠北部东北向突出部之东侧边缘,越突出部北端至毗牙井(贝什托格拉克)以东之居卢訾仓遗址。

毗牙井(贝什托格拉克)位于库木塔格沙漠与克孜勒塔格山之间断层带的东端。此断层带为榆树泉盆地至罗布淖尔间唯一可取得水源处。古道由毗牙井(贝什托格拉克)沿断层带西南行,经矮山井(波波拉井)、保贝拉井(科什库都克),至羊塔格库都克。《魏略·西戎传》云:“从沙西井转西北,过龙堆,到故楼兰。”“沙西井”疑即羊塔格库都克。其位置正当库木塔格沙漠北部突出部之西侧。今古道自羊塔格库都克西南分歧:一道往西北,沿断层带北缘,越白龙堆,经罗布淖尔北岸之土壤汉代烽燧遗址北,至楼兰遗址;一道往西南,至婁羌。往西北至楼兰之古道,应即西汉之北道。

楼兰遗址,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,其方位应在白龙堆西。据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,其确切位置在东经89°55'22"、北纬40°29'55"(¹⁷)。

西汉南道,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,自鄯善始。但“鄯善国,本名楼兰”,楼兰的确切位置已如前述,当在罗布淖尔西北岸、今孔雀河口之西南,为北道之始。昭帝元凤四年(前77年)，“大将军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”，“介子遂斩王尝归首”、“乃立尉屠耆为王，更名其国为鄯善”，大约于此时迁都扞泥城，“于是汉遣司马一人、吏士四十人，田伊循以填抚之。其后再置都尉。伊循官置始此矣”(¹⁸)。据此，南道始于鄯善，应为昭帝元凤以后的事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云：“自玉门、阳关出西域有两道。”此处玉门与阳关并列。故西汉时，出两关后，道路似有交叉，出玉门关者可行南道，出阳关者亦可行北道。故出使莎车者，可至玉门都尉治所(¹⁹)，而婁羌去胡来王唐兜，亦可由南道“东守玉门关”(²⁰)。王国维认为，汉时南北两道分歧，不在玉门、阳关，而当自楼兰故城始(²¹)。此意见于元凤前当是。但鄯善国都南迁后，南北两道分歧处，当已移往楼兰故城以东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所称“鄯善当汉道冲”，乃指南迁后之扞泥城。

西汉南道阳关至鄯善段的具体路线，据近年实地调查，自阳关西出后，越沙丘至崔木土沟，再西南至多坝沟，折西北至湾窑。沿途有汉烽指路，蜿蜒古道，历历在目，露宿野炊遗迹犹存。湾窑即西汉大煎都候障遗址。南道至此与北道相合。自此西行，至羊塔格库都克。如前所述，元凤前，与北道同向西北，至楼兰分歧。南道向西南，沿车尔臣河西行。元凤后，于羊

塔格库都克西南分歧。南道向西南,沿库木塔格沙漠与克孜勒塔格山间断层带南缘,经库木库都克、土牙、班扎布拉克,罗布淖尔南岸之库什兰萨、落瓦寨和库木塔格沙漠西端之墩力克、米兰、羊达什喀克,至婁羌。按汉伊循城遗址位于今米兰,鄯善国都扞泥城即今若羌县城⁽²²⁾。故现存之西南向古道,应即西汉之南道遗迹。

(四)

东汉时期,玉门关入西域的路线,走向明显改变,究其原因,乃政治形势的变化所促成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云:“自建武至于延光,西域三绝三通。”随着汉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起伏和国力的强弱,汉与匈奴在西域继续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斗争。争夺的焦点,仍是对以车师前国为中心的吐鲁番盆地的控制,并扩大至以伊吾为中心的哈密盆地。早在西汉末,汉对西域控制的丧失,即由车师开始。平帝元始中(公元1—5年),车师后王姑句叛入匈奴。王莽始建国二年(公元10年),车师后国辅国侯狐兰支再“举国亡降匈奴”。不久,史陈良、终带等杀戊己校尉刁护,又叛降匈奴。自此,车师前、后国地尽失。王莽天凤三年(公元16年),焉耆诈降,袭杀五威将王骏,戊己校尉郭钦引兵而还,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。后数年死,“西域因绝”⁽²³⁾。经五十余年后,东汉对西域的经营,自对伊吾的控制开始。明帝永平十六年(公元73年),“命将帅,北征匈奴,取伊吾卢地,置宜禾都尉以屯田,遂通西域”。“明年,始置都护、戊己都尉”。明帝死后,焉耆、龟兹趁机“攻没都护陈睦”,匈奴、车师则围攻戊己校尉。章帝建初元年(公元76年),“乃迎还戊己校尉,不复遣都护。二年,复罢屯田伊吾,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”。和帝永元二年(公元90年),大将军窦宪遣副校尉阎槃“掩击伊吾,破之”。“三年,班超遂定西域,因以超为都护,居龟兹”。复置戊己校尉,“居车师前部高昌壁,又置戊部候,居车师后部候城,相去五百里”。和帝死后,“西域背叛”。安帝永初元年(公元107年),“诏罢都护”。延光二年(公元123年),以班勇为西域长史,西屯柳中,“勇遂破平车师”。顺帝永建六年(公元131年),“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,傍近西域,匈奴资之,以为抄暴,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,置伊吾司马一人”。此时,匈奴已日益衰落,残留于天山之北的势力,仍不时侵掠伊吾与车师后部。桓帝元嘉元年(公元151年),匈奴呼衍王攻伊吾屯城,不果。从此,汉与匈奴在车师、伊吾的争夺,再不见于史籍⁽²⁴⁾。综上所述,东汉以来,由于匈奴势力的日渐衰落,匈奴对西域、尤其对车师、伊吾的控制不断削弱,东汉王朝具备了重新选择进入西域道路的可能。

如前所述,西汉时期,玉门关经楼兰至渠犂的道路,沿途自然条件极为严酷。但是,库鲁克塔格山脉以北的地理环境,对中原入西域的交通,则相对较为有利。吐鲁番—哈密盆地

为天山山间陷落盆地,北为博格多山和喀尔里克山,南为觉罗塔格山和噶顺戈壁,西为乌肯山,东为甘肃之北山山地。吐鲁番—哈密盆地,地形相连,中间仅以沙山相隔。由于盆地的特殊自然环境,使其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产棉区和瓜果之乡。盆地内,沙丘和风蚀地仅有零散分布,且多集中于盆地南侧,对于盆地内的交通,未造成难以克服的障碍,因而成为东汉以来中原前往西域较理想之通道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云:“自敦煌西出玉门、阳关,涉鄯善,北通伊吾千余里,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,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。此其西域之门户也,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。伊吾地宜五谷、桑麻、蒲萄。其北又有柳中,皆膏腴之地。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、伊吾,以制西域焉。”这段记载有两点错误:一、伊吾位于今哈密境,置屯田后,玉门关北通伊吾的路线,既可避三陇沙、白龙堆之险,道路又较直捷,绝无可能向西南至鄯善,再北经罗布淖尔北岸之白龙堆,越库鲁克塔格山脉,向东北至伊吾的道理。二、车师前部治交河城,戊己校尉治高昌壁,柳中在高昌壁东南⁽²⁵⁾,其位置均在伊吾之西,故伊吾至车师前部的道路应向西行。但是,这段记载尽管有上述错误,仍然真实地反映了东汉王朝对吐鲁番—哈密盆地战略地位的认识,记述了东汉玉门关至车师前、后部的道路。

关于这条道路,还可自窦固进击匈奴的行军找到线索。据《资治通鉴·东汉明帝纪》,永平十五年(公元72年),命窦固、耿秉、耿忠等议击匈奴事。耿秉议曰:“当先击白山,得伊吾,破车师,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;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,破此,复为折其左角,然后匈奴可击也。”又据《后汉书·窦固传》、《后汉书·耿秉传》,永平十六年(公元73年),窦固、耿忠“率酒泉、敦煌、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,至天山,击呼衍王”,“呼衍王走,追至蒲类海,留吏士屯伊吾卢地”。十七年(公元74年)夏,“复出玉门击西域”。耿秉“议先赴后王,以为并力根本,则前王自服”,“乃上马,引兵北入”。后王降,“其前王亦归命,遂定车师而还”。从窦固两次进击西域的路线看,大体是遵循耿秉的建议的。第一次出击,自酒泉塞西北出,经北山山地、喀尔里克山北,至巴里坤湖。返回时,经喀尔里克山口南至伊吾,于此留兵屯田,以作进军车师的前进基地,大军则南入玉门关。第二次出击,出玉门关北至伊吾,折西北,经喀尔里克山与博格多山山口出天山,折西至务涂谷(今吉木萨尔南),然后南经博格多山山口至交河城,再东返伊吾而还。窦固东返的路线,即上述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的路线。

但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,东汉北道始自车师。《魏略·西戎传》记载新道的路线,亦未北经伊吾。《隋书·裴矩传》云:“发自敦煌,至于西海,凡为三道。……其中道从高昌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,度葱岭,又径犂汗、苏对沙那国、康国、曹国、何国、大小安国、穆国,至波斯,达于西海。”仅隋代北道,即经由天山北路达于西海的道路,始北经伊吾至蒲类海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云:“玉门关,在(敦煌)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。谓之北道,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。此西

域之门户也。”又,《周书·异域传·高昌国》云:“自燉煌向其国,多沙碛,道里不可准记,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,又有魍魎怪异。故商旅来往,多取伊吾路云。”据此可证,自东汉至隋,由玉门关至车师前部(高昌)的道路,均多取捷径,向西北,经沙碛,至车师,而不取北经伊吾,再折西至车师的路线。《后汉书·耿恭传》载,明帝永平十七年(公元74年),以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,“屯前王柳中城”。又,《后汉书·班勇传》载,班勇曾向朝廷建议,“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,西当焉耆、龟兹径路”。但由于西经故楼兰的西汉北道渐被堙废,东汉的路线改向西北,由玉门关经柳中至车师的新北道已经开辟,故班勇的建议终未被采纳,而于安帝延光二年(公元123年),以班勇为西域长史,“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”。又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云:“柳中县,……当驿路,城极险固。”由此可知,经由柳中的新北道,为东汉时的主要交通干线。这条路线,早在西汉即已有人提出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云:“元始中,车师后王国有新道,出五船北,通玉门关,往来差近,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,避白龙堆之厄。”但由于当时尚不具备开辟此道的政治条件,故延至东汉始正式开通。

至于东汉北道的具体路线,据《魏略·西戎传》的记载,“从玉门关西北出,经横坑,避三陇沙及龙堆,出五船北,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治所高昌,转西与中道合龟兹”。故自小方盘城西出后,应经临要隧(T11、D20)、D18(T9a),折向西北,渡疏勒河,经何黑咀井,折向北,经红柳井子,直向北,经东盐湖西,达噶顺戈壁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称“莫贺延碛”)南侧,沿碛南之突出山、龙头山,转西北至鄯善(即辟展),径兰干至高昌。“横坑”、“五船”今不可考。“横坑”,或即今哈密以南之东盐湖洼地。“五船”,徐松《汉书西域传补注》卷下云:“今小南路有小山五,长各半里许,顶上平而首尾截立,或谓之五船也。”此说不确。清代之小南路,乃哈密往西北,经头堡、二堡、三堡、一湾泉、七角井,折西南,经东、西盐池,七克腾木,鄯善至吐鲁番的道路。另有南路,由哈密经三堡,西南行,经四堡、五堡、十三间房,沿噶顺戈壁北缘,经鄯善、鲁克沁至吐鲁番。此两路均为《周书·异域传》所称之“伊吾路”。东汉之北道既不经伊吾,其道当更偏南,故“五船”不当在小南路。按,“五船”乃对“雅丹”地貌之形象称呼。“雅丹”地貌在正当风口处,多作长条形分布,顶上平而四周截立,形象似船。故“五船”或指鄯善以南之风蚀沙丘地,唐称“大沙海”,宋称“大患鬼魅碛”,今称“库木塔格”者。玄奘、王延德均经由此砂碛以北抵高昌。东汉北道似亦绕道此砂碛之北。鄯善,清代名辟展,《魏书·高昌传》称“白棘城”,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称“白力城”,《王延德行记》称“宝庄”(26)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和《魏略·西戎传》所称之“五船北”,或指同一地点。

据黄文弼《吐鲁番考古记》,于今吐鲁番盆地南部艾丁湖北岸,有一东西向古道,自鲁克沁东南之得格尔,经穷阿萨、乌盘土拉、毕占土拉、卜柯洛克土拉、阿萨土拉,至屋威梯木,转西南至托克逊。沿途有古时营堡遗留之土墩。“土拉”即突厥语土墩之义。在卜柯洛克土拉